

伟人的困惑

古来庸人无困惑。他们视生存
为唯一要义，推而广之的一点点奢念，
也不离口腹之欲、声色之娱。
这是历史的惰性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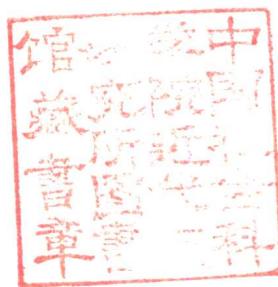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沈阳

中華人倫國志

●古中國思想者卷

●主编／范炯 ●副主编／张研
张晓虎



下

卷首语·思想者的困惑

○范 焰

罗丹有尊不朽雕像《思想者》：一个坐姿男子凝神领首，托腮沉思。这是概括出来的人类智慧的形象。只有人类，才有思想，只有哲人，才会沉思。而哲人——思想者正是人类的精华。他们思考的对象是作为客体的大千世界，也是作为主体的心灵天地，是自我观照，也是涉世品味。他们思考的方式是抽象的逻辑思辨，也是形象的艺术感悟；是哲学，也是诗。他们是自由的，是思想的主宰；也是局促的，是思想的仆役。所有的思想者都无例外地体验过两种情绪：豁然开朗，发现的惊喜；百思不解，无路的困茫。这是一切时代局中者的典型状态。伟大与渺小，互为表里，昭示出殚思竭虑者悲壮而又执著的面容。他们几乎个个感叹过时运不济，但他们又几乎谁都不是真正的宿命论者。因为，“穷究物理”、“搜索枯肠”是他们生存的形式，他们永远做着“求解”的努力，以渺小的微躯成就人类的伟大，把思考的成果连同困惑奉献给已知和未知的后人们，因之而成就自身的伟大和不朽。

然而，这一切却永远伴之以生之痛苦和死之困惑。一切过去了的时日，无不属于那个过去了的旧世界，而一切旧世界思想者的痛苦和困惑，无不长久地回旋在人类总体的记忆之中。它是一笔财富，是一个个新思考的起点，人类通过一级级困扰

的阶梯，走向新境界。

其实，罗丹的《思想者》的姿态，只是思想者的一般状态，是抽绎出来的代表性类型，具体而真正的思想者类型，原是极其生动而又千奇百怪的：

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剪影，是手撫胡须，怅望远水，轻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仿佛不经意的喃喃私语，道出了“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苏轼语）的名言至理，而其潜台词，则道出了生命的悲凉。这悲凉之精辟所在，正是人生的自觉。自觉之后的怆然，源自于有限人生与无限追求的反差。天不假年，他甚至无法看清自己具体追求的荒谬，更无论那千古告白的私心所愿。

孔子该怎么想呢？

孟子，那个欲以“王道”晓喻天下，与大国君王坐而论道、神色怡然的“亚圣”，误入思想者流实在有些委屈，他以王佐自命，心期平治，很有些“一语定乾坤”的书生梦想，然而梦归梦、真归真，这个富于实践热情的思想家，无疑早已随战国风云一同烟逝，然而他的“民贵君轻”的思想精华，却化作一把无形的尺度，存入后世无数士民的心中，使昏暴之君无不闻之而胆丧，致有明太祖怒弃其书于地而曰杀之惶惶失态举动。虽然，贱视天下万众的帝王专制却在“亚圣”之后绵延了两千余年，他的书意也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成了专制主义的理论工具。

孟子该怎么想呢？

庄子，一个手敲瓦盆、歌送亡妻的怪人。一个实际上的逃世者。他的存在只是一种象征，一则寓言，他用自己的逍遙风范和爽脱言谈提示时人和后人安渡苦海余生的心法儿，他是后世一大批高人、隐士和狂生的“产婆”，而这一系列人所构成

的意义，也大抵是一系列象征和寓言，虽有警世之意，但面对暴君和奴隶的世道，终归无补、无谓、无用，生也有涯，苦也无涯。

庄子该怎么想呢？

墨子，人称“小生产者的代表”，而他本人何曾享用过这么时髦的华冠？他义利并重，相对于那个时代来讲，是个新型的侠客壮士。在攻伐中他呼吁“非攻”，在仇杀中他呼吁“兼爱”，而且以武对武、以恶抗恶，尽可能简化思想和语言，而以身体力行警醒嗜杀成性、利欲熏心的统治者：士民可畏，相煎何急！他是个直截了当反对战争和仇杀的激进思想家。然而，人类的杀戮历程并未因这一巨人的真诚和热切而中止，战争的魔影至今笼罩在那同一片天空，而杀伐的因由，仍然是赫然在目的两个字：私利。

墨子该怎么想呢？

荀子，他发现了人心的险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的竞争本能。可他并没有失望，而是燃起了“疗救”的热情，他像基督一样一再告诫人们，你们生来利欲熏心，你们是有罪的。但他没有像基督一样求告人们信仰什么虚空之物，而是强调后天学习、向善的重要，鼓励人们重塑心灵。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忠告。然而，无数个世代过去了，无数个治世实以治心为本的政治家、思想家，仍苦苦执著于那片人性的荒野，在人世心灵的机巧纠缠中，证实着努力的惘然。

荀子该怎么想呢？

先秦诸子，百家纷纭，构成了中国思想的源头。大而观之，他们无不以治世特别是治国为要义，无不做着“文化英雄”的梦。然而，细敲细考，便会恍然大悟：这些伟大的思想

者实与治国者隐然两别，治国者治世，安邦安民；思想者治心，究本究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法术刑赏为主旨的法家学说，实在谈不上更多的“中国特色”，它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其间差别，只在程度和分寸。那些为封建专制主义奔走呼号者的价值，已于“治国者卷”中充分体现，而此处的略去，旨在保持“思想者”的纯粹。

随着“百家争鸣”成为历史名词，生活在中国皇权时代的思想者们，更为显著的特点是寂寞的奋斗。虽说在私有制下，“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但思想者的自由是难以从根本上加以剥夺的，而思想文化的超前律又往往决定着有价值思想的当时命运：与统治思想相抵牾而横遭非议。于是，这又形成了另一个显见的传布规律，即司马迁之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伟大的思想犹如石崖上的野花，艰难而又执拗地向后人昭示自己的存在。而作为自由思想的“生身父母”，一些敏感而又孤独的时代巨人，为了在严酷的环境中得以生存，也为了给人类留下一点点珍贵的文化“骨血”，他们或效阮籍酗酒佯狂，或效陶渊明归去来兮，或效苏东坡洒脱不羁，或效李渔放浪形骸。这些不幸中得以“苟全”微躯的大幸者，较之另一些不得善终的历史叛逆者，简直成了后世文人士子钦慕的人生范本，而如司马迁、徐渭、李卓吾、金圣叹、方以智、戴名世，或“触讳”，或“恃才”，或“骂世”，最终难得善终，其间较为“幸运”的也只如徐渭狂狷一生，穷愁以歿，而司马迁的死因则至今还是个迷。这就是那个黑暗年月里思想者的宿命。压抑的时代造就奇特的天才，而后又亲手扼杀了他们，周而复始，构成一部中国思想界的“人才史”。

旧时代杀死了这些优秀的时代之子。正由于他们不属于这

个时代，而历史老人则以其悠悠岁月、无限情怀，收留、拥抱着他们，并不无惋惜、不无宽容地指出他们历史的局限和思考的盲点。

司马迁和王充，一前一后，两汉时期最杰出的时代思潮的制高点，他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昏昧的世事，分别从史学和哲学高度创造出人类思想的当代纪录，可他们终于跌坐在自己曾一度大胆怀疑过的“天人感应”的尘埃之中，迷失自我。

阮籍、鲍敬言、陶渊明、范缜，这些黑暗和迷狂世界的“独醒者”，他们洞穿时代的目光，甚至越过了我们今人的头顶，自谓“大人先生”，鼓吹“无君无司”，构画“桃源仙境”，倡言“人死灯灭”。这些惊世骇俗的言语曾怎样或激怒或照亮了那些个昏乱的岁月，然而，他们在洞穿一切之后，却无法在现实世界里为自己找到一席之地，只有冥游于那杳不可确知的“人间仙界”和上古三代。思想者在时代的局中，前进有时也意味着倒退，这是不是更深一重的悲哀呢？

在思想者的行列，我们没有理由冷落用形象思辨的诗人们。

李白与杜甫，一仙一圣，高扬起整个盛唐的风采，令人千载之下，心驰神往。然而“百年歌自苦”的定律，无论对圣还是对仙，都是适用的。苦吟的兴衰“诗史”自不必说，即如李白的为人和为诗，究有哪些是真正使他得意的篇章片断呢？“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世人所见的诗人的快活，其实是诗人极至痛苦的幻象。有俗人读李诗，以为他喜欢“故作惊人语”，醉后狂言，以夸饰为快；而稍稍留意历史真相的人便不难发现，“盛世悲音”实际是个极普遍的现象，欲破解其间真意，非先破“盛世”的迷信不可。古之盛世之于今人，犹月球之于地球人，有几个人能跳出“为贤者讳”的旧史书的框框，洞

悉它的负面呢？即如“盛唐”而言，“边庭流血成海水”和奸臣弄权于朝、路人斗狠于途的世道，有多少人佞佛、多少人信道、多少人谈玄？其后的深意，恐怕不独是时尚使然吧？而“功名只向马上取”的所谓时代精神，不过是每个古代强盛民族的集体意识罢了。国强、民安原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独汉唐如此。而汉、唐以及明朝中道的陡然衰败，无不与其盛世危机的总爆发，身处其间，敏感异常的诗心诗怀，如何消受？在以人类、人生和生命本身为慈怀对象的纯粹的诗人那里，现世的一切痛苦都是巨大的，而一切欢乐都是虚幻的，微不足道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为什么？非不能也，不得也。其真正的羁绊，最终是在诗人的心里：大道所达，当非心之所愿。

李杜的困顿，也是苏轼及其后诸如徐渭、金圣叹、李渔、纳兰性德和王国维的。他们具有共同的诗人气质、悖俗气质，也就具有共同的与时抵牾的困顿。所不同的，首先是时代，是北宋的理学与党争的学术、政治空气之窒闷，是明末世俗的糜烂和政局的昏暗，是有清一代前期氛围的压抑和后期思潮的动荡。其次是因之而形成的个体差异：苏东坡亦诗亦仕，诗词豪放，宦海沉浮；徐文长亦狂亦困，狂介蔑俗，缘狂困俗；李渔亦庄亦颓，游戏人生，蒙垢人口；纳兰性德亦聪亦顽，得天独厚，得天独厚；王国维亦新亦旧，诗学实学，两得两失。这些悟性极高的诗心独具者，几乎都把文学艺术当作自己的精神避难所，不期然而然地记录着心路历程，以成就自身独特的人生使命，塑造着人类“苦闷的象征”。其间的苏东坡、王国维则又以其身跨文学和学术两端，而与方以智、戴名世、汪中构成另外的意义。

这些时代的评判者们或以学悖，或以诗狂，或以才傲，抗俗抗世，又以深厚的功力、奇警的识见，阐发精义，贡献哲思，在思想、学术的各个方面独辟蹊径。但在那个思想禁锢空前严酷的年代，仍为当政所不容，轻者为时所忌，潦倒一生；重者飞来横祸，身首异处。

然而，另有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学问家，也给我们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意绪。我们收容了清代大儒阮元作为代表。这位笃诚的“国粹主义”学者，在他以毕生功力建立了乾嘉学派的一些不朽里程碑的同时，也在那个中西交融的年代，为我们留下了自己的不惑之惑。这位聪明的学者，没有如当时许多泥古不化者对西学的真理之光视而不见，而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求知的兴趣，写出了《畴人传》等著作，介绍西学和中西科技史知识，对天文学等应用科学给予充分肯定，但他同时又以慷慨激昂的传统卫道士口吻，穿凿附会，像童稚吹牛一样，把你的说成我的，试图将西学的所有发明权“通通收归国有”，甚至不惜到《山海经》中找依据，以满足中国上自君王，下至庶民“中央上国”传统的集体虚荣心。其实，稍加分析，不难推断，连阮元本人也未必尽信其言，而其字缝里所透出的心态究竟说明什么呢？阮元不言，我们亦不必尽言。

泱泱中华古国，数千年文明史上思想的巨人举不胜举，我们这里选评的人物，甚至难以概括其类型。但有心人不难从中看出两个极为突出的特点：他们都是现实政治的失败者，而在困厄中成为思想巨子；都是思接千载的智者，而又都颠踬于各自时代的樊篱前。伟大和无奈都是那样鲜明，那样不容置疑。

思想是最最深不可测的领地，只有两种人才会涉足：学有

专长，识见独具，语出惊四座，如众作者；糊涂胆大，不知深浅，终身在门外，如笔者。中国的思想史源远流长，但这一系列思想的创造者们都早已作古，如何把这一长一短令人怅惘的现象作一勾连，使后之来者得以寻绎出思想之由来和演进之迹，我想到了“困惑”的题旨。我认为，困惑正是思想流变代不已的基因。一代英哲留下了自己的结论也留下了自己的疑问，于是下一代便有了思考的基点和目标，而诸如修身之惑、生存之惑、自由之惑、性灵之惑、治乱之惑这些几近永恒的困惑，则更是不断生成新思想的坯基。

相对于单纯的政治现象和权力世界，思想和人文文化的宽容性，应是其基本而又合理的内含和要求，这一宽容性，不光针对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而言，而且适用于思想界各流派本身。因为，历史事实已经多次证明，那些不够宽容的流派一旦与权势结合，成为“独尊”，也就很快蜕变为教条，堕落为“教鞭”，丧失其作为思想和思想家的本真，虽能盛极一时，终成历史负累，有的甚至流变为历史垃圾，那些随历代皇朝浮沉的“显学”的命运即是如此。这才是思想者的真正的悲哀。

思想者应永远有其超尘拔俗的文化品格。思想着的人类，永远不应划地为牢。

思想没有疆界，没有范式。百家争鸣是一切伟大思想的催生剂，真理更是争论的结晶。一位朋友说：没有争论的世界是冷清的世界，没有争议的人物是平庸的人物，我深以为然。

浮光掠影，写下这些不着边际的杂感，私心所愿，是希望引起朋友们阅读的兴趣。书是写书者的思想总结，更是读书者的思想起点。胡思乱想是读书者较之写书者更大的一份自由。我已试着行使了这份自由的权利，相信更多的读者朋友理解我的

苦心，并理解我的朋友们“用上帝赐予的声音”（契诃夫语）所琢磨出的各自不同的“叫法”——思想表述的通俗化、形象化。

“让思想冲破牢笼”。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是对此书主旨最为精辟的概括。

1991年7月7日夜

撰 稿 人 名 单

(以文章先后为序)

李向平	荣 真	傅 杰	李广良
范振国	张世明	万绳楠	刘新风
张晓虎	朱蓓蓓	刘明华	成复旺
陆玉林	陈 飞	杨 林	鲁培康
朱端强	李 雷	黄爱平	徐 枫

目 录

卷首语·思想者的困惑………	范 焰
孔子	
古中国理想的浮沉………	(1)
墨子	
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	(18)
孟子	
在王道与人格之间………	(35)
庄子	
天下沉浊不可与庄语………	(51)
荀子	
凝视人性的荒野………	(69)
司马迁	
担负岁月的受难者………	(82)
王充	
划破混沌的极光………	(118)
鲍敬言	
横迈时空的预言家………	(138)
陶渊明	
永远的南山梦………	(148)
范缜	
迷狂世界的清醒………	(168)

李 白

脱去尘浊的飞扬 (186)

杜 甫

百年歌自苦 (202)

苏 轼

时代的“幽人” (218)

徐 清

眼空千古的独行者 (243)

李 贽

“询问者”与“道德英雄” (258)

金圣叹

悲凉的妄想者 (278)

方以智

繁霜如雪孤南征 (310)

李 渔

无可告诉的戏剧人生 (329)

戴名世

恃才·骂世·触讳 (351)

纳兰性德

浸染于古国的忧郁 (368)

汪 中

“盛世狂生”的诅咒 (391)

阮 元

一代名儒的探索与困惑 (411)

王国维

昨夜西风凋碧树 (424)

孔子：

古中国理想的浮沉

○李向平

“半部论语治天下”。惟有中国才会发生这样的奇迹。幸亏孔子本身不能被一分为二，不然，中国人将会继续坚信这样的奇迹。

千百年了，孔子的生平事迹几乎是家喻户晓。只要是中国人，不论识字读书与否，大抵都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个孔子。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尊孔或批孔，则更使孔子深入人心。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也不管你是引以自豪还是不屑一顾，历史与社会的事实就是如此。孔子的身影曾经覆盖过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孔子的思想曾经主宰过无数中国人或脆弱或坚毅的灵魂。独尊也好，如神般崇敬也罢，抑或是必欲打倒而后快，中国人还是把孔子给牢牢地记住了。当年为劝说诸侯采用自己思想主张的孔子，不能不说这是席不暇暖而形象渺小，没想到给伟大的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痕迹，留下了汗牛充栋的笔墨官司和众说纷纭的是非议论。再过几个世纪又怎样？历史依然故我：孔子还会活着，痕迹不会消失，笔墨官

司仍将继续打下去。

面对着这一文化奇迹，不得不使人生发出思古之幽情，引申出忧今之深意。

那是在公元前551年，孔子诞生在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其祖先本为宋国的名门贵族，后因躲避战乱迁居鲁国，从而失去优越的贵族门第。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虽也做过鲁国的陬邑大夫，但孔门已难以复兴。孔子出生时家道是贫贱的，青年时代他做过管理仓库和牛羊的小官；虽然后来曾为鲁国代理司寇，但为时甚短。总地说来，孔子一生主要是在周游列国、聚徒讲学与修订典籍中度过的，政治上难能春风得意，基本是一个在野的知识分子。

那是在公元前479年，孔子在一肚子宏愿未能实现的惆怅中悄然死去。他所处的时代，依然还是礼崩乐坏，高岸为谷，正在急剧动荡之中。陈旧的政治道德制度已经崩坏，新型的社会价值秩序尚未建立。一切都变得无序，一切努力都有可能失败，也都有可能成功；有可能销声匿迹，也有可能名垂千古。存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孔子，不但努力过而且是孜孜以求。从他死后所产生的影响来说，他成功了，并彪炳史册，万古流芳。

诚然，这也很使人纳闷：孔子生前的奋斗为什么只能获取死后的成功与美誉呢？

孔子活着的时代，周王朝周天子的威信与地位已经一落千丈，其无上权力逐层下移到诸侯、大夫手里。整个社会丧失了权力和秩序中心，众多的诸侯国不断地被吞并、被消灭，一些氏族贵族保持不了传统的世袭地位，而新兴的统治阶级迅速富

裕壮大，在军事上要求兼并侵吞以扩张发展自己的统治势力。

一方面，是天子、诸侯、大夫政治等级森严分明的周礼统治秩序的彻底崩溃；另一方面，当时整个中国社会都处在一种动荡无序的暂时状态，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在期待政治道德秩序的重新建构。统治者在显示实力收买人心并大肆进行军事兼并，企图充当整个天下的统治者；被统治者则在希望尧舜般的圣王再世，并已分别依附投靠在各大政治势力门下，希望早日结束这带来痛苦和灾难的动荡年月。所以，当时的社会理想无一不染上政治色彩，知识分子的任何努力也都只能在各诸侯国君之间进行，任何文化理想也都摆脱不了这个时代与社会的规范甚至是局限。

作为当时知识分子代表的孔子，自然是超脱不了这些规范和局限。孔子本人也不乐意去如此努力。他宁愿在政治理想方面守先待后、持平保守。所以，虽然那有着森严分明政治礼仪秩序的周王朝社会已经崩溃，任何恢复和重建周代礼制的设想与企图都将是无济于事，但是，孔子却始终持守着自己固有的社会理想与政治寄托，始终以周王朝的德治礼仪作为自己的理想，主张维护由周礼所构筑起来的政治统治秩序。也正因为政治方面的这种态度，孔子在经济上也希望维持原有的经济结构，宁肯平均贫困也不要贫富分化过于激烈，反对追求财富与权贵，以免除经济力量对于君臣父子既定秩序及贵族人格尊严的损害与破坏。

孔子思考问题对待人生世事的基本态度是信而好古，宁愿依恋相信历史而不肯轻信顺从时代及其演变。在他的心目中，周王朝社会秩序及周公的制礼作乐的过程已被充分理想化了。